

比较视域下职业教育赋能内蒙古农牧区发展的“三维适配”框架构建

哈申格日乐¹, 姚春林²

¹内蒙古自治区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 内蒙古 呼和浩特

²天津城建大学外国语学院, 天津

收稿日期: 2026年7月7日; 录用日期: 2026年8月6日; 发布日期: 2026年8月17日

摘 要

内蒙古农牧区正处于传统畜牧业向现代生态农牧业转型的关键期, 但职业教育供给与区域发展需求之间存在显著的结构性错配。本文以社会嵌入理论为分析视角, 构建“空间-时间-主体”三维分析框架, 系统诊断内蒙古农牧区职业教育面临的现实困境。研究发现, 职业教育赋能农牧区发展的核心障碍表现为三重错配: 空间上固定校区难以覆盖地广人稀的农牧区, 时间上统一学期制与农牧业生产节律脱节, 主体上多元利益相关者缺乏协同联结机制。通过比较分析澳大利亚TAFE模式与黑龙江农垦职业教育体系, 提炼出“供给随人走、教学随农时、利益共同体”的共性经验。据此, 本文构建了包含空间适配、时间适配、主体适配三维度的“三维适配”框架, 并阐释了三者循环互促的协同机制。在此基础上, 本文进一步分析了框架实施可能面临的财政、制度与文化障碍, 并提出试点先行、分步推广的突破路径, 为边疆民族地区职业教育精准服务乡村振兴提供理论参照。

关键词

职业教育, 内蒙古农牧区, 三维适配, 社会嵌入理论, 比较教育

Comparative Study on “Three-Dimensional Adaptation” Framework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Empowering the Development of Inner Mongolia’s Agricultural and Pastoral Areas

Hashengerile¹, Chunlin Yao²

¹Language Institute, Inner Mongolia Autonomous Region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Hohhot Inner Mongolia

²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Tianjin Chengjian University, Tianjin

文章引用: 哈申格日乐, 姚春林. 比较视域下职业教育赋能内蒙古农牧区发展的“三维适配”框架构建[J]. 职业教育发展, 2026, 15(8): 245-253. DOI: 10.12677/ve.2026.158336

Received: July 7, 2026; accepted: August 6, 2026; published: August 17, 2026

Abstract

Inner Mongolia's agricultural and pastoral areas are transitioning from traditional animal husbandry to modern ecological agriculture, yet a structural mismatch persists between vocational education supply and regional development needs. Applying social embeddedness theory, this paper constructs a "space-time-subject" analytical framework to diagnose the dilemmas facing vocational education in these regions. The study identifies three core mismatches: spatially, fixed campuses fail to cover sparsely populated pastoral areas; temporally, the uniform semester system conflicts with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rhythms; and institutionally, stakeholders lack collaborative mechanisms. Through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Australia's TAFE model and Heilongjiang's State Farm vocational education system, the paper extracts common experiences, such as "supply following people, teaching following seasons, and shared interests", and develops a "Three-Dimensional Adaptation" framework. This framework elucidates the mutually reinforcing mechanisms among spatial, temporal, and subject adaptations. Furthermore, the paper analyzes potential obstacles to implementation, including fiscal, institutional, and cultural factors, and proposes a pilot-first, gradual expansion strategy, offering theoretical guidance for vocational education to precisely serve rural revitalization in border ethnic regions.

Keywords

Vocational Education, Inner Mongolia's Agricultural and Pastoral Areas, Three-Dimensional Adaptation, Social Embeddedness Theory, Comparative Education

Copyright © 2026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1. 引言

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 职业教育作为与区域经济发展关联最为直接的教育类型, 被赋予服务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重要使命。《2025 职业教育改革与发展报告》明确提出¹, 职业教育要服务乡村振兴战略, 为广大农村培养以新型职业农民为主体的农村实用人才。内蒙古自治区作为我国北方重要的生态安全屏障和农畜产品生产基地, 承担着建设国家重要农畜产品生产基地的战略任务。据《内蒙古统计年鉴 2025》数据², 2024 年末全区常住人口中乡村人口占比仍超过百分之三十, 畜牧业产值占第一产业比重超过百分之四十五。然而, 与产业转型升级的迫切需求形成鲜明对比的是, 农牧区劳动力技能结构长期处于低水平均衡状态。根据“技能内蒙古行动”实施方案(2022-2025 年)设定的政策目标³, 到 2025 年需新增技能人才 75 万人以上, 开展补贴性培训 125 万人次以上, 其中农牧民工参加职业技能培训 35 万人次以上, 这从侧面反映了当前技能提升的迫切性与现实差距。

与此同时, 内蒙古职业教育体系在服务农牧区发展方面存在明显的“离农”倾向。虽然 2023 年全区理工农医类专业占比已达 63.1%, 服务重点产业链专业占比达 77.6%, 但农牧类专业招生占比仍偏低, 毕

¹<https://www.chinazy.org/info/1006/21072.htm>

²<https://tj.nmg.gov.cn/datashow/pubmgr/publishmanage.htm?m=iframePublish&cn=A017&url=/datashowmgr/content/Content-Show.htm?code=37804&prefix=cbw>

³<https://m12333.cn/policy/mumdz.html>

业生留在旗县及以下区域就业的比例不尽理想。据通辽职业学院公开数据显示⁴,该校毕业生本地就业率近年稳定在百分之四十以上,已在全区高职院校中位居前列。即便如此,仍有大量毕业生选择到盟市首府或其他省市就业,农牧区合作社和龙头企业的技术岗位存在较大空缺。“培养的留不住、需要的招不来、来了的用不上”成为制约农牧区经济社会发展的突出瓶颈。

已有研究对职业教育服务乡村振兴进行了较为丰富的探讨。韩剑颖[1]研究了职业教育服务乡村振兴的需求变化与实践路径,王远[2]探讨了教育强国视域下职业教育助力乡村振兴的逻辑向度,韦妙等[3]分析了职业教育助力乡村人才振兴的价值定位与行动路向,董苓和阿木古楞[4]考察了西部农村职业教育赋能乡村振兴的逻辑与困境。然而,现有研究多从宏观政策层面进行应然性论述,缺乏对内蒙古等边疆民族地区特殊性的深入观照,更缺少基于比较视角的框架性建构。本文采用比较研究法,选取澳大利亚TAFE(技术与继续教育学院)模式和黑龙江农垦职业教育体系作为比较对象,旨在回答以下问题:域外成功经验能为内蒙古提供何种启示?如何构建适用于内蒙古农牧区特殊性的职业教育赋能框架?

2. 理论视角与分析框架

本研究以社会嵌入理论为理论基础。该理论由波兰尼在《大转型》中系统阐述,后经格兰诺维特等学者发展为经济社会学的核心分析工具[5]。嵌入理论的核心命题是,经济行为不是悬浮于真空中的独立系统,而是深嵌于社会关系、文化传统和制度环境之中。将这一视角迁移至教育研究领域,职业教育同样不是脱离社会土壤的独立系统,而应被视为“嵌入”区域产业结构、人口分布、文化传统和生产方式之中的社会子系统。

“嵌入”的反面是“脱嵌”。当教育系统的运行逻辑与地方社会的运行逻辑发生断裂时,教育便失去了服务地方发展的能力。内蒙古农牧区职业教育面临的困境,本质上正是“脱嵌”的集中表现:职业院校按照统一的教育规范运行,却未能回应农牧区分散的人口分布、独特的农业生产节律和多元主体的利益诉求。因此,破解困境的根本出路在于推动职业教育重新“嵌入”农牧区的社会、经济与空间结构之中。

基于嵌入理论的核心逻辑,本研究提出“空间、时间、主体”三维分析框架。这一框架的建构逻辑是:职业教育的“嵌入”状态可以从三个维度加以衡量。第一个维度是空间维度,考察职业教育是否在空间上可及于服务对象。第二个维度是时间维度,考察教学安排是否契合于服务对象的生产生活节奏。第三个维度是主体维度,考察是否实现了多元利益相关者的协同共生。三个维度分别对应职业教育的“地理嵌入”“时间嵌入”和“结构嵌入”。这一三维框架一方面作为诊断工具,用于识别现实困境;另一方面作为建构工具,用于指导适应性框架的设计。

3. 内蒙古农牧区职业教育的三重错配困境

上述“空间、时间、主体”三维分析框架,既是识别问题的诊断工具,也是建构路径的理论依据。以下将运用这一框架,从空间、时间、主体三个维度依次考察内蒙古农牧区职业教育与区域发展需求之间的错配表现。需要说明的是,三个维度的划分服务于分析的需要,现实中的三重错配并非各自独立,而是相互交织、彼此强化。空间上的不可达加剧了时间上的错位,时间上的错位又削弱了各主体参与协同的意愿与能力,而主体协同的缺失反过来使空间和时间的僵化供给模式难以被有效打破。因此,下文对三重错配的逐一剖析,既是揭示问题本身,也是为后续比较经验的引入和适配框架的构建奠定分析基础。

3.1. 空间错配:固定校区难以覆盖地广人稀的农牧区

内蒙古自治区地域辽阔,全区面积118.3万平方公里,农牧区人口密度极低。2023年全区137所职

⁴https://epaper.tongliawang.com/paper/pc/content/202512/11/content_40438.html

业院校实施提质培优行动计划, 但优质职业教育资源高度集中于呼和浩特、包头、赤峰等中心城市, 旗县及以下区域的职业教育机构数量稀少、服务半径有限。对分散在广袤草原和农田上的农牧民而言, 前往固定校区接受职业培训面临着高昂的交通成本和时间成本。

与此同时, 农牧业生产具有鲜明的空间分散性。生产活动不是集中于特定产业园区, 而是分散于广袤的草原、农田和牧场之中。这种生产活动的空间离散性, 要求职业教育服务也必须具备相应的“流动性”和“可达性”。当前的职业教育供给模式, 恰恰是以固定场所、固定时间的“学校本位”模式来应对“田野本位”的生产实际, 空间错配由此产生。

3.2. 时间错配: 学期制教学与农牧业生产节律脱节

农牧业生产具有强烈的季节性特征。在牧区, 春季的接羔保育期和秋季的出栏期是牧民最为忙碌的时段; 在农区, 春播期和秋收期同样是劳动力需求最为集中的时段。在这些关键农时牧季, 农牧民的全部精力投入生产活动, 根本无法分身参与固定时间的课堂学习。

然而, 职业院校的教学安排通常遵循统一的学期制, 与农牧业生产周期严重脱节。值得关注的是, 内蒙古部分旗县已开始探索解决方案。呼伦贝尔市阿荣旗利用冬季农闲“黄金期”, 将职业技能培训班搬到村民“家门口”, 通过“理论加实操”相结合的模式开展教学, 吸引了近百名农户参加⁵。这一地方实践表明时间适配具有现实可行性, 但尚未成为制度化的普遍安排。据相关调研, 培训时间与农忙冲突仍是农牧民不参与职业技能培训的首要原因之一。

3.3. 主体错配: 多元主体利益联结机制缺失

职业教育服务农牧区发展涉及政府、职业院校、农牧业龙头企业、农牧民等多类主体。在现实中, 四类主体的目标函数存在明显分化。在政府层面, 职业教育统筹职能分散于教育、人社、农牧、乡村振兴等多个部门, 虽然自治区已围绕农牧业等重点产业建设了6个市域产教联合体和11个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 但政策碎片化问题仍有待整合。在学校层面, 职业院校的考核评价主要围绕招生规模、就业率等指标展开, 缺少服务本地农牧区的专项考核。在企业层面, 农牧业龙头企业和合作社规模普遍偏小, 虽然全区已有128所职业院校与239家企业联合举办448个“订单班”, 但深度合作仍集中在少数院校。在农牧民层面, 受传统观念影响, 加之职业教育投入的机会成本和收益不确定性, 参与意愿偏低。各主体之间缺乏深层次沟通协调机制, 最终形成“培养的留不住、需要的招不来”的恶性循环。

三重错配之间相互强化。空间错配增加了农牧民参与的时间成本, 时间错配削弱了农牧民的参与意愿, 主体错配导致资源配置缺乏统筹, 三者耦合叠加, 形成了职业教育“脱嵌”于农牧区发展需求的系统性困局。

4. 域外经验的比较分析

前文运用三维分析框架诊断了内蒙古农牧区职业教育面临的三重错配困境, 揭示了职业教育“脱嵌”于农牧区社会结构的内在机理。然而, 困境的揭示只是问题的一半, 更有价值的工作在于回答“如何破局”。比较教育研究的独特价值, 正在于通过考察域外相似情境下的制度设计与实践经验, 为本土问题的解决提供参照和启示。以下选取两个与内蒙古具有可比性的案例作为比较对象。第一个是澳大利亚的TAFE学院模式。澳大利亚与内蒙古同样面临地广人稀的地理约束, 其TAFE学院通过移动式教学、模块化课程和行业主导治理, 在服务偏远地区方面积累了系统经验, 对解决空间错配和时间错配具有直接的借鉴意义。第二个是黑龙江农垦职业教育体系。黑龙江农垦与内蒙古在气候条件和农业形态上高度相似,

⁵<http://www.arq.gov.cn/Elderly/News/show/1391421.html>

其“场校一体”的组织模式和“农忙实训、农闲理论”的教学安排,为破解主体错配和时间错配提供了经典范例。下文将从空间、时间、主体三个维度,依次呈现这两个案例的核心经验。

4.1. 澳大利亚 TAFE 模式: 面向偏远地区的弹性教育供给

澳大利亚与内蒙古在地理特征上具有高度相似性,大量人口分散于偏远地区。TAFE 学院作为澳大利亚职业教育的主体力量,在服务偏远地区方面积累了成熟经验。

在空间维度上,澳大利亚实施了移动式覆盖策略。联邦政府通过 TAFE 技术基金投入 5000 万澳元支持设施升级,其中 3100 万澳元专项用于“移动 TAFE”项目,预计在全国实施多达 12 个项目,将技能培训送到偏远地区和原住民社区⁶。南澳大利亚州已启动招标设计建造 4 个移动培训单元,分别提供健康、网络安全、酒店管理和汽车维修等领域的培训服务,有效破解了固定校区服务半径有限的空间困境。

然而,必须指出的是,移动 TAFE 的成功运作依赖于一系列深层制度条件。首先,澳大利亚拥有高度完善的职业教育认证框架,如 AQF(澳大利亚资格框架)和培训包(Training Packages)体系,确保了不同地点、不同形式的培训在质量标准和资格认定上具有等价性。这意味着,牧民在移动 TAFE 上完成的模块化课程,其学分与在城市 TAFE 学院修读的课程具有完全同等的效力。其次,联邦与州政府之间的财政分担机制相对清晰,TAFE 技术基金有明确的专项支出渠道和绩效评估标准。第三,澳大利亚地广人稀但基础设施水平较高,公路交通网络和通信基础设施为移动培训单元的巡回运行提供了基本保障。这些条件共同构成了移动 TAFE 从政策理念转化为可操作实践的支撑系统。

在时间维度上,TAFE 学院实行模块化课程制度和学分银行制度。每门课程被拆分为若干相对独立的学习模块,学习者可根据自身工作和生活安排自主选择学习进度,累计学分可在体系内互认并可衔接高等教育。对于农牧区成年学习者而言,这种灵活机制使其能够在兼顾生产的同时分阶段完成技能提升。

我们关注这一机制的深层逻辑:模块化课程的有效性取决于两个前提。一是课程开发必须基于精准的行业能力标准(即培训包中明确界定的能力单元),二是学分互认必须建立在统一的质量保障体系之上。澳大利亚技能质量管理局(ASQA)对全国 TAFE 机构的注册和课程认证实施统一监管,保证了学分在不同机构之间的可信度。此外,模块化课程的设计和持续更新需要行业力量的深度参与,这又回到了澳大利亚行业主导治理的结构性特征,行业在课程开发中具有法定话语权,而非仅仅是征求意见的对象。

在主体维度上,TAFE 学院建立了行业主导的治理结构。澳大利亚《2011 年国家职业教育与培训监管署法案》⁷明确规定了行业在职业教育决策中的法定地位,确保行业需求从“建议”变为“刚性约束”,从根本上避免了供需脱节。这一制度安排的深层逻辑是:行业不仅参与咨询,而且在国家行业技能委员会等机构中拥有法定的席位和决策权重,课程内容、能力标准、评估方式等核心要素的确定权实质性掌握在行业手中。这种法治化的治理结构,是澳大利亚职业教育供需匹配度较高的制度根源。

综上所述,澳大利亚 TAFE 模式的成功是一个多因素协同的制度系统产物。其经验对内蒙古的启示不应简单化为“配置移动教室”的技术性模仿,而应上升为制度性借鉴,包括建立统一的质量认证和学分互认体系、建立专项财政保障机制,以及更重要的是,在治理层面建立行业(即用人主体)从“参与者”向“决策者”转变的制度通道。当然,内蒙古与澳大利亚在行政体制、财政能力和基础设施水平上存在显著差异,完全照搬澳大利亚模式既不现实也无必要,但其“制度先行、标准统一、财政配套”的系统推进逻辑,值得本土化改造后加以借鉴。

⁶<https://www.dewr.gov.au/my/skills-reform/tafe-technology-fund>

⁷<https://www.legislation.gov.au/C2011A00012/2014-07-01/2014-07-01/text/original/pdf>

4.2. 黑龙江农垦模式：深度嵌入农业产业链的体系化办学

黑龙江省农垦总局管辖的职业教育体系,是全国农业领域产教融合的标杆。在空间维度上,黑龙江农垦实现了场校一体的组织布局。职业院校建在农场内部,学生学习和生活的场域就是未来的就业场域,“课堂在田间、教室在牧场”使职业教育真正做到了“送教上门”。在时间维度上,农垦职业院校实行“农忙下田实训、农闲课堂理论”的教学安排。春播期和秋收期学生进入农场顶岗实训,冬季农闲时节集中进行理论教学,使在校学习与农业生产完全同步。在主体维度上,黑龙江农垦职业学院先后与完达山药业、九三油脂集团、北大荒商贸集团等多家企业签订订单培养协议,在400余家大型知名企业建立实习就业基地。毕业生初次就业率始终保持在百分之九十以上,用人单位满意度达百分之九十八以上。企业深度参与人才培养全过程,形成了“人才共育、过程共管、成果共享、责任共担”的利益共同体。

我们需要进一步追问:黑龙江农垦模式为何能做成?其成功的关键条件是什么?至少三个因素是制度性的、而非偶然的。

第一,农垦体制的历史遗产。黑龙江农垦系统(北大荒集团)实行“政企合一”的体制,农场的行政管理职能与生产经营职能高度统一。在这一体制下,职业院校作为农垦系统的“内部机构”,天然嵌入生产体系之中。“场校一体”不是事后协调的结果,而是体制同构的必然,院校与农场同属一个管理系统,人事、财务、资源配置均在同一体系内统筹。这种体制在内蒙古农牧区并不存在。内蒙古的旗县、苏木、嘎查实行基层行政体制,职业院校则隶属于教育行政部门,两者之间缺乏农垦体制那样的“组织血缘”关系。这意味着,黑龙江模式中“场校一体”的组织基础,在内蒙古是难以复制的。

第二,大规模集约化生产的规模效应。黑龙江农垦拥有全国最大的国有农场群,耕地面积广阔,农业生产的高度集约化和机械化要求大量具有专业技能的技术工人和管理人才,形成了稳定的、大规模的技能人才需求。而内蒙古农牧区的经营主体以家庭牧场和中小规模合作社为主,生产规模小、人才需求分散、单个用人主体的需求量有限。在这种产业组织形态下,企业参与职业教育的边际收益较低,利益共同体的构建面临不同的经济逻辑。

第三,土地制度和产业集中度。黑龙江农垦的土地归国有农场统一经营,产业组织化程度极高。相比之下,内蒙古牧区的草牧场实行承包到户的经营制度,农牧民是独立的生产决策单位,其培训需求的个性化程度高、组织化难度大。培训需求侧的高度分散,是内蒙古难以简单移植“场校一体”模式的深层产业约束。

尽管存在上述体制差异,黑龙江农垦模式的核心逻辑,“深度嵌入”,对内蒙古具有根本的启示意义。具体而言,其“农忙下田实训、农闲课堂理论”的时间适配机制,其“人才共育、过程共管、成果共享、责任共担”的主体协同原则,均具有超越体制的普遍价值。内蒙古需要在承认自身产业组织形态(家庭经营为主体)的前提下,探索符合分散化需求特征的“嵌入”方式,不是照搬“场校一体”的组织形式,而是萃取“供需深度咬合”的机制精髓,在分散化、个性化的需求格局中,探索更具弹性的供给模式。

4.3. 共性经验的逻辑提炼

将两种模式进行并置比较,可提炼三条共性经验。第一条是“供给随人走”,即不要求服务对象向教育资源集中,而是推动教育资源向服务对象流动。在澳大利亚表现为移动TAFE,在黑龙江表现为“场校一体”。对内蒙古的启示在于,必须打破“固定校区、固定班级”的思维定式,建立流动供给的意识和能力。本土化审思得到的结论是,内蒙古不具备黑龙江的体制基础,也不具备澳大利亚同等水平的交通和通信基础设施,因此“供给随人走”在内蒙古的实现路径应是“云端平台+区域流动点+定期巡回”的混合模式,而非单一的实体流动。第二条是“教学随农时”,即尊重农业生产的自然节律,让教育时间适应生产时间。澳大利亚通过模块化课程实现个体化的时间适配,黑龙江通过“农忙实训、农闲理论”

实现全校性的时间适配。本土化审思得到的结论是, 内蒙古更适宜借鉴澳大利亚的模块化思路, 因为农牧户的生产节奏个体差异较大(不同畜种、不同作物的忙闲时段不同), 统一的“农忙农闲”划分难以覆盖全部群体, 模块化、个体化的时间弹性更为适用。第三条是“利益共同体”, 即让用人主体从职业教育的“旁观者”变为“决策者”和“受益人”。澳大利亚通过法治化的行业治理结构实现, 黑龙江通过体制内的利益捆绑实现。本土化审思得出的结论是, 内蒙古在产业组织形态分散的条件下, 构建利益共同体需要新的制度设计, 可能需要在合作社层面建立集体协商机制, 或以旗县为单位建立产业联盟式的对话平台, 而非等待单个企业主动参与。

5. “三维适配” 框架构建

基于上述分析, 内蒙古农牧区职业教育“三维适配”框架的构建以三个核心判断为逻辑起点。第一, 职业教育赋能农牧区发展必须以“再嵌入”为前提, 简单的资源增量投入无法解决结构性的错配问题。第二, 空间、时间、主体三重适配构成有机整体, 三者互为条件。第三, 内蒙古不能照搬单一模式, 必须汲取共性逻辑并结合自身特殊性构建本土化框架。与澳大利亚 TAFE 模式高度依赖法治化的行业治理结构、黑龙江农垦模式深度依托政企合一的体制遗产不同, 内蒙古“三维适配”框架的设计必须充分考虑本地区产业组织形态分散、行政协调成本较高、基础设施水平不均衡等现实约束, 在借鉴共性逻辑的同时, 选择符合本地条件的实现路径。

维度一是空间适配, 即构建“固定、流动、云端”三位一体供给网络。第一个层面是优化固定校区的功能布局, 将中心城市职业院校打造为“农牧区职业教育资源中心”。第二个层面是建立区域性流动教学点, 参照澳大利亚“移动 TAFE”经验, 在各牧业旗县配置移动实训设备按季度巡回开展培训。需要指出的是, 考虑到内蒙古幅员辽阔与基础设施条件的现实差距, 流动教学不宜追求澳大利亚式的高标准移动培训单元, 而应因地制宜, 从简易配置起步, 优先覆盖需求最为集中的区域和时段, 逐步积累经验、迭代升级。内蒙古阿荣旗的实践已证明这一模式的本土可行性。第三个层面是搭建远程云端教学平台, 开发蒙汉双语在线课程, 以直观形式降低学习门槛。

维度二是时间适配, 即建立“农忙实践、农闲理论”弹性教学日历。考虑到内蒙古农牧户的生产节奏个体差异较大, 养牛户与养羊户的忙季不同, 种植户与养殖户的农时亦不相同, 不宜采取黑龙江式全校统一的“农忙农闲”划分, 而应借鉴澳大利亚模块化课程的思路。第一个层面是调整教学日历, 允许涉农涉牧专业在关键生产时段安排顶岗实训, 在农闲季节集中安排理论教学。第二个层面是推行模块化课程与学分银行制度, 将课程拆分为若干技能模块, 农牧民可分阶段完成学习, 累计学分达到要求即可获得证书。

维度三是主体适配, 即构建“政、校、企、社”四方协同治理结构。第一个层面是强化自治区层面的统筹协调机制, 在现有 6 个市域产教联合体和 11 个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基础上, 建立常态化跨部门协调机制。鉴于内蒙古产业组织形态分散、单个企业参与能力有限的特点, 主体适配不能简单依赖企业与院校的“一对一”合作, 而应以旗县为单位搭建产业联盟式的对话平台, 使分散的用人主体能够形成集体谈判和集体协商的能力。第二个层面是扩大“订单班”覆盖面, 通辽职业学院通过与企业共建“订单班”覆盖 310 名毕业生, 实现“入学即定岗、毕业即就业”, 订单班毕业生起薪高出百分之十五至二十, 这一经验应扩大推广。第三个层面是建立“需求反馈、培养供给、就业跟踪”的全链条信息闭环。

三个维度通过内在互动形成循环增强的整体。空间适配为时间适配提供物质载体, 使弹性教学具备实施条件。时间适配为主体适配创造深度交互场景, 使四类主体获得真实互动平台。主体适配为空间适配和时间适配提供制度保障, 确保经费稳定拨付和实训内容精准对接。

6. 框架实施的障碍分析与突破路径

三维适配框架的设计立足于内蒙古农牧区的现实约束,但从“设计”到“落地”之间仍存在多重障碍。任何宏观制度设计若不能预先识别执行层面的结构性阻力,都可能在实施中遭遇“最后一公里”困境。本部分从财政、制度、文化三个维度系统分析框架实施可能面临的主要障碍,并提出试点先行、分步突破的推进思路。

6.1. 财政障碍: 专项投入不足与可持续性风险

空间适配所需的移动实训设备配置、巡回教师交通补贴和云端教学平台建设,均需要专门财政投入。当前,内蒙古自治区旗县级财政普遍吃紧,多数旗县属于转移支付依赖型财政,职业教育经费主要依赖上级拨付,缺乏自主设立专项的财力。同时,移动教学和云端平台的运营维护成本往往被低估,设备折旧、课程更新、师资巡回的常态化支出,比一次性建设投入更具财政压力。若没有稳定的经费保障机制,三维适配可能陷入“启动即终点”的困境。

突破思路包括以下内容。建议采取“自治区专项引导 + 旗县配套 + 社会资本补充”的混合筹资模式。自治区层面设立“农牧区职业教育流动教学专项”,明确资金用途和绩效目标;对积极参与的旗县给予配套资金倾斜;同时探索与企业、合作社的成本分担机制,使受益主体承担合理比例。此外,可利用现有乡村振兴衔接资金、农牧业技术推广经费等既有渠道进行整合投入,避免另起炉灶带来的新增财政压力。

6.2. 制度障碍: 多部门协调与考核导向的错位

职业教育的管理权限分散于教育、人社、农牧、乡村振兴等多个部门,三维适配涉及课程设置、师资配置、经费拨付、实训基地建设等多项事权,需多部门协同决策。在现行行政体制下,跨部门协调的交易成本较高,容易陷入“九龙治水”的困境。更为深层的是,职业院校的考核评价体系仍以招生规模、就业率、技能大赛获奖等传统指标为主,教师职称评审侧重论文和课题,服务农牧区的成效并未纳入核心考核指标。考核是指指挥棒,不改变考核导向,院校和教师缺乏实质性参与三维适配的内生动力。

突破思路如下。第一,在自治区层面建立职业教育服务乡村振兴的跨部门联席会议制度,由分管教育的领导牵头,将分散于各部门的职能在议题层面进行统筹。第二,将“服务农牧区发展成效”纳入职业院校的办学质量年度考核指标体系,设置包括“农牧区生源占比”“涉农涉牧专业本地就业率”“流动教学覆盖人次”等可量化指标。第三,在教师职称评审中增设“社会服务”类别,将送教下乡、课程开发、实训指导等纳入评审内容,使服务农牧区从“额外负担”转化为“职业发展通道”。

6.3. 文化障碍: 观念惯性与参与意愿不足

三维适配框架的最终服务对象是农牧民,而农牧民对职业教育的认知和参与意愿构成隐性的文化障碍。受传统观念影响,部分农牧民对“上学”的认知仍然停留在“年轻人脱产到学校读书”的刻板印象中,对弹性学制、模块化学习、在线课程等新型模式缺乏理解和信任。同时,技能培训的收益具有长期性和不确定性,而农牧业生产的投入决策具有短期性和风险规避特征,两者之间的时间偏好错位使农牧民倾向于“不参加”而非“尝试”。此外,蒙汉双语教学资源的不足也构成语言文化层面的参与障碍。

突破思路有三。第一,借助基层行政网络,进行点对点宣传和动员,以“熟人社会”的信任机制弥补制度信息的传播盲区。第二,树立“身边的榜样”,选取当地通过职业教育实现技能提升和收入增长的典型人物进行现身说法,以具象化的成功案例消解观念阻力。第三,在课程资源开发中优先保障蒙汉双语教学材料的供给,减少语言因素对参与意愿的抑制效应。文化障碍的消解不能期待一蹴而就,需要通过持续的社会动员和可见的示范效应逐步积累。

6.4. 总体推进策略：试点先行、分步推广

考虑到上述障碍的系统性和复杂性,三维适配框架不宜“全面铺开”,而应采取“试点先行、分步推广”的审慎策略。建议在内蒙古东、中、西部分别选取 1~2 个具有代表性的旗县作为试点区域,优先推行动态教学点和云端教学平台建设,同步在涉农涉牧专业试行弹性教学日历和模块化课程。试点周期建议设定为 2~3 年,期间建立“实施-监测-反馈-调整”的动态循环机制,定期评估各项举措的实施效果、成本效益和可推广性。在试点经验成熟后,分批次向其他旗县推广。这一策略既尊重了制度变革的渐进性规律,也为框架的持续优化预留了调适空间。

7. 结语与政策启示

本文以社会嵌入理论为分析视角,构建了“空间、时间、主体”三维分析框架,系统诊断了内蒙古农牧区职业教育面临的三重错配困境。通过比较分析澳大利亚 TAFE 模式和黑龙江农垦职业教育体系,提炼出共性经验,并构建了“三维适配”框架。本研究的理论贡献在于将社会嵌入理论引入职业教育服务区域发展的分析,突破了单一因素的归因局限,同时将比较教育视角从“制度移植”转向“逻辑萃取”。

基于上述框架,提出三条政策建议。第一,推广“流动教学”模式,设立“农牧区职业教育流动教学专项”,支持移动实训设备配置和教师下乡送教。第二,扩大“订单班”和弹性学制覆盖面,在涉农涉牧专业推行弹性教学日历,同步建设模块化课程体系和学分银行制度。第三,深化产教融合共同体建设,完善企业参与职业教育的激励机制,将服务农牧区发展的成效纳入考核指标体系。

参考文献

- [1] 韩剑颖. 职业教育服务乡村振兴: 需求变化、现状评述与实践路径[J]. 中国职业技术教育, 2024(5): 76-85.
- [2] 王远. 教育强国视域下职业教育助力乡村振兴的逻辑向度与推进路径[J]. 教育与职业, 2024(7): 28-34.
- [3] 韦妙, 刘小艳, 譙欣怡. 职业教育助力乡村人才振兴: 价值定位、现实困境与行动路向[J]. 职教论坛, 2024, 40(2): 5-14.
- [4] 董苓, 阿木古楞. 西部农村职业教育赋能乡村振兴的逻辑、困境与路径[J]. 教育与职业, 2023(9): 21-26.
- [5] Granovetter, M. (1985) Economic Action and Social Structure: The Problem of Embeddedness.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91, 481-510. <https://doi.org/10.1086/228311>